

阶层再生产情境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刘 博

[摘要] 社会治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稳定化与社会秩序规范化基础之上的,其首要目的是推动社会建设,核心内涵是加强社会保障,最终效果是改善社会民生。从社会学分层理论视角来说,社会治理的创新嵌入在“社会重建”的问题域中,社会重建不仅是社会秩序的重新组织化,更包括文化价值观念的重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要有三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机制转型”,即当社会发展背景转换的时候,党如何调整执政策略的方向,如何探寻继续深化社会改革的路径;第二,“组织再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如何通过既有组织团体的改革来发挥新的作用;第三,“道德重塑”,即重新建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判断,丰富各个阶层的文化资本,提升群体的社会信心。

[关键词] 阶层再生产; 社会分层; 社会治理; 文化资本; 执政党

[中图分类号] D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15) 02-083-6

在党和国家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具体社会治理实践领域中,如何理解社会治理的概念以及如何创新社会治理的方法与对策,成为当前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际上是在总结以往社会建设成果与社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更具指向性、包容性与规范性的层面来提出现阶段党和国家在社会领域的总体方针,其内涵与任务同以往所谈到的“创新社会管理”具有承接性和延续性。“民生”仍然是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核心内涵。其所包含的内容与意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一个涉及社会结构变迁与阶层分化的问题。对于转型期中国来说,这一特点尤为明显。社会阶层组成的变化以及分层趋势的定位,实际上决定与主导了社会治理与服务的对象与方向。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民众生活方式的变迁与价值观念的转变都为创新社会治理增加了难度与挑战,所以,有必要从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梳理与探讨分层理论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结构变迁与分层理论整合

回顾 20 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主要存在三种研究取向或范式,即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一般来说,我国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是以市场经济地位的设定为主要取向的。这类研究最鲜明的特点是以职业为社会分层标准,或者运用马克斯·韦伯的权力、财富、声望等范畴,从多元的角度(这种“多元”有时还把职业、群体、收入混合在一起)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国家社会主义取向下的分层研究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无处不在,在市场力量逐步发育并参与配置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仍然具有主导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社会阶层的调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力量在不同层面上的影响力。以社会利益群体为取向的研究认为,阶级阶层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青年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方式与身体实践研究”(编号: 13CSH037) 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4-11-10

[作者简介] 刘博,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 上海 200233

在涵义上应该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中国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阶层结构呈现“碎片化”特征，采用利益群体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利益关系。⁽¹⁾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化，阶层问题呈现出“突发性”、“密集性”与“群体性”特征，相对于其他关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分析，阶级分析视角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和应用。在国内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中，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阶级分析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性，几乎都把正在经历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作为凸显阶级分析意义的现实前提。⁽²⁾因此，“回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重新构成为解读中国当下社会分层的一种视角与范式。⁽³⁾

阶级和阶层的分层视角也可以理解为：阶级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阶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表层的社会结构。韦伯对于社会分层的解释，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新的思考。韦伯认为，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是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韦伯把阶级和阶层（阶层在社会学分层研究中一般是指“地位群体”）的分析方法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本身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并且，在特殊的条件下，这种历史过程并不一定是单向的，它既可能是从阶级分层社会过渡到阶层分层社会，也有可能是从阶层分层社会转变为阶级分层社会。⁽⁴⁾

比较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阶段性，当前，从阶级阶层视角来分析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核心问题在于，第一，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系条件下，如何解读我国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状况？第二，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新的社会阶级分化？第三，阶级的产生是否会导致阶层对抗？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社会财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发展开始出现“断裂”。⁽⁵⁾在这一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各种利益群体，包括政府的经营性牟利行为，和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相互交叉，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本”的力量再次出现，使得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出现了新型的“劳资关系”，即私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且，国有企业中原来的劳动关系，也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与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劳动者和国家资本之间的关

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和冲突。在我国，劳动要成为稀缺性生产要素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提高劳动的技术构成，使得那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成为掌握现代科技的技术工人；第二，取决于劳动的组织，一个组织起来的劳动者阶级可以在市场中通过各种方法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获得与劳动相适应的经济收入和保障。因此，从社会学分层理论来分析当前社会治理创新，其实是对社会治理理念源头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效性，需要对当下社会阶层现状做一个较清晰的判断与描述。

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变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则更多地是立足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实践，来自于我们每日都在经历的日常生活本身。⁽⁶⁾从社会阶级阶层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阶段性与过程性，需要在承认某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内不平等状况存在的基础上，建构不同阶级利益的制衡机制。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能通过其代理组织进行谈判、沟通和妥协才能得到解决，“共享、多赢、自治、合作”应该是和谐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的最大公约数。只有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通过“谈判”和“对话”达到相对一致的利益和目标，阶级阶层之间才有可能由对抗走向合作。

二、阶层分化与党的执政转型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转变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执政党转型改变了它与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即由代表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转变为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或者说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一）执政转型中的责任定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必然会引起执政党和工会、民间团体等群众组织、各民主党派及各种利益群体关系的变化。这里潜在的问题是，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党自身的建设如何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以什么样的制度设置来保证党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中持续、有效的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在我国宪法框架下，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代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人民的利益。当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唯一的执政党，它所代表的人民利益的形式或者方式不再像以前那

样明确了。在改革开放以前，共产党代表的是工人、农民这样的工农联盟利益。从革命党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任务来说，在当时，它代表的是阶级的利益，讲的是阶级斗争。当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执政党的思想和路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4年我国人大修改宪法时，将“三个代表”理论正式写进宪法，为执政党的转型奠定了理论和法律基础。“三个代表”理论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它意味着，执政党不仅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也要代表农民的利益，也要代表资本的利益，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干部的利益，等等。但是，每个群体或阶层，都有着利益上的冲突，比如说，资本家或老板和工人的利益之间会有冲突；知识分子的权利意识同政府权力之间会有矛盾；底层民众和政府之间也有冲突。这些问题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是很明显，并且会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下被打压下去。因此，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首先面临的是执政党如何代表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问题，尤其是在不同阶层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

不同阶层之间会有利益矛盾与冲突。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冲突以什么样的形态方式出现，其结果如何。这个问题涉及到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重建。我们现在提到的社会治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只有在社会秩序得到了重建以后，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社会治理是建立在社会有序性管理的基础上的，而现在的社会是处在相对无序或失范状态下的。

社会阶层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各阶层之间、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社会治理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理顺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治理的前提是要有许多个平台，以让不同阶层的人可以自由、平等的讨论和博弈。这个讨论和博弈不是无序的、无组织的争吵，而是有规范的、有监督的。比如，工人权利的诉求，就需要根据相关的劳动法，并依靠工会的力量来协调；农民或者农民工的权利诉求，要依靠相应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知识分子可以依靠媒体舆论的宣传方式来表达。当不同的阶层形成自己的利益组织的时候，就可以以组织代言人的方式进行讨论、妥协，在博弈过程中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双赢或者多赢。

（二）执政转型中的功能发挥

社会建设和治理是可以在当下既存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当然，这个制度框架要进行改革，赋予

它在具体管理和服务中新的功能。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就应该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人民代表在这个制度下和平台上进行讨论和博弈，然后达到相对的一致。政协制度也是如此。这样就能为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民主机制奠定基础。但是，在当下中国，存在一个误解，以为民主就是搞运动，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实际上并不是民主，如果是的话，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显现出的所谓“大民主”。民主的本质应当是一个妥协、谈判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妥协是不同群体之间通过谈判和协商之后，达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共识。目前，在已经形成不同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从而使不同利益的代言人进行讨论，是社会治理得以实行的关键。虽然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提供这样的机制，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多数人民代表的身份是官员、商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代表的广泛性、程序性和合法性上往往会使民众有一种“被代表”的感觉。

所有的这些思考，都要回到一个根本的点上，即我们的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为我们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理论和实践空间，然而，我们还没有很好认识到这个空间对于社会建设和治理创新的重大意义。另外，我们很多的治理方式是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的，关键是要重新焕发原有的组织“群众性”作用，这包括政协、工会，还有我们的共青团、青年会、妇联等组织。如果这些组织能够进行调适并发挥积极作用的话，相信很多社会建设中的问题都能得到合适的解决。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组织往往被理解成“摆设”或者“工具”。实际上，党的执政转型意味着，工会等组织不仅仅是执政党领导下的用来团结广大群众的组织，同时也要代表这些群体来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

如果说，在革命党时期，工会组织对执政党的忠诚表现为工会组织直接听从于执政党的领导，那么，在现阶段，工会组织对执政党的忠诚应该表现为自觉地反映和维护工人群众包括工薪阶层的利益，使之成为广大工薪阶层利益的代表。这种新型的关系将加强和维护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加强执政党和它本来就与之血肉相连的工人阶层的联系。

从社会良性发展的角度来说，为不同阶层、群体提供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利益相对一致的共识，即使存在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组织，也不会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意见能加强执政党的执政

基础。同时，这些组织的自我管理，会更好的为执政党的执政、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

社会治理创新的另一个前提，就是要有相对的社会公正和公平，也就是说，不能把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持续的挤压在“生存线”上，要解决他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建立健全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制度的完善就能避免这部分人成为社会秩序重建的障碍，社会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从最近几年党和政府的执政经验来看，重点关注和首要实施的大事，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调合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问题。

因此，社会治理创新要有三个基本的出发点或基础：第一，当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时候，执政党如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第二，我们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很多组织，包括人大，政协，工青妇组织等，是可以有效地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而非简单的工具，这些制度和组织的改革能给社会带来活力；第三，着重解决社会公正和公平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才能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基础，同时，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回到当前中国社会发

三、社会建设方向与治理创新路径

当前，我国社会基于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的各个群体阶层，在交往和互动过程中似乎更多的表现为冲突和矛盾的激化与对立。随着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对社会资源拥有量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群体的阶层利益并促使群体成员逐渐形成了对于所属阶层和其他阶层的理解和看法。阶层的内在凝聚性进一步促使了人们对于本群体阶层意识的产生。这种阶层意识的出现首先表现在不同群体各自所拥有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如何协调各个群体的利益冲突与文化价值矛盾，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社会转型进程与基本矛盾化解

事实上，尽管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但协调与融合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分配与文化差异，一直是我国体制改革与结构转型的主要目标。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本身就是需要相互依存与相互协调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社会群体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有其自我发展与自我协调的内在机制。在人类历史上，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才形成了不同职业的产生与不同人

群的分化。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之间在分工基础上的高度相互依赖性，使得任何一个群体如果脱离了其他阶层或群体就无法独立存在，每一个阶层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都扮演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社会有机体结构并非各种社会群体总和的简单相加。社会有机体自身存在的运行规律与整体功能对于各个群体，既有组成上的需要，也有着特殊的影响效果，这些因素都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程度的不断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结构调整的特殊过程中，社会整体更需要各个群体不断协调各自的摩擦与冲突，为社会的共同进步提供支持和动力。

最近几年，从逐渐稳定的中国转型实践来看，党和国家正在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来化解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两个最基本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但是我们已经把容易触发大规模冲突的因素给消除了。从2006年开始，国家明确取消农业税，基本上化解了底层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直接冲突。在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农民起义还是革命党发动的革命，是否能有效地动员农民阶层，直接决定了运动的成败。农民阶层的作用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显著，尽管其中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客观评价。新农村建设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支持农业的发展，并使得农村得到较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也在提高。这样说，不是说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了贫困地区，在边远欠发达地区还是有很多的贫困农民，贫困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但是，一个总体的判断前提是存在的，即，我国农村是在逐步改善之中，农民的生活也在逐步提高。

第二个矛盾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两大阶级的对抗，它主要表现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民工能够享受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使得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得到较大的缓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主要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中，直接触发两大阶级对抗的原因是当工人阶级处在极端贫困化的境地，他们的劳动收入已经不能维持最基本的需要，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我国正在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包

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底层民众，提高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虽然不能说已经解决了所有的贫困现象，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生存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绝对贫困化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都为当下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如果没有上述这两大基本矛盾的化解，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同时，这些变化也促使研究者开始反思中国社会学近年来的阶层研究，面对群体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与逐渐增多阶层冲突，如何调解与整合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阶层问题的关键。

（二）文化资本培育与社会阶层整合

在我国现实中，阶级合作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要符合执政党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执政党实现社会整合，要在承认阶级利益差别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调控职能，努力缩小不同阶级的利益差别，建构得到社会各阶级认同的利益目标；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准则，进行利益整合，尤其是要防止过大的贫富分化，保护弱势阶级的利益。阶级利益的诉求必然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公民的政治参与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化的、合法的途径得到满足，就有可能寻求制度外的政治参与，甚至采取过激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首先应该以利益整合为核心；依托党的组织网络、组织制度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政治整合为保障；并且以法律整合为主要手段，以文化价值整合为重要途径。⁽⁷⁾

社会阶层文化整合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文化资本的培育。通俗地说，文化资本就是文化素养，指不同阶层的文化素养。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一个人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较高的学力，也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相对于经济资本的积累，文化资本的积累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文化资本的积累能够有效地为普通平民的社会地位提高创造条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涉及到各种合法知识，包括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举止、品味、生活方式等。⁽⁸⁾他的阶层研究主要通过资本的数量来划分阶级，而在同一个阶级内部，又根据资本类别来划分阶层。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由于出身和进入时间的不同，也会有所区别。⁽⁹⁾

从宏观层面来说，文化资本的提高也是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发展的重要条件。一般来看，民主政治比较成功的国家，整体上的文化资本水平相对也较高。民主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义务。也就是

说，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时不能妨碍其他人的民主权力，个体要为其他人行使民主权力提供义务。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资本积累，民众的文化素质较低，民主活动就有可能成为“街头革命”，社会就有可能处在无政府状态。有研究表明，文化资本水平越高，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相对比较缓和，就会较少采取极端化的方式表示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表示出极端的情绪和行动。⁽¹⁰⁾现在阶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从长远来看，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慢慢走向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和有效的协商平台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于提高各阶层的文化素质，采用比较合理的方法化解阶层之间的矛盾，会有积极意义。

（三）社会的秩序重建与治理创新

阶层文化资本的培育实际上包含在整个“社会重建”的复杂过程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进行社会秩序的重建。在西方国家，从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即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初步工业化过程。这一阶段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转型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从封建时代到工业时代的社会秩序重建。当我们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同样也是社会转型，也面临着社会秩序的重建的问题。

社会秩序的重建不仅仅是社会的组织化，还要重建道德观念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甚为重要。那么，我们的道德秩序重建的基础又在哪里？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过程，除了要加强法治以外，我们还要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信仰中，即传统文化中，找到重建道德秩序的基础，它包括几千年来来的大文化，也包括60多年来的“小文化”。同时，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这个过程也许会很长。因为10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走了一条很不寻常的道路，既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甚至殖民化影响，也受到从苏俄引进的列宁主义的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改变了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逻辑。因此，现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混合型的社会，包含多重复杂因素，不能用一种社会发展逻辑进行解释。

当下的中国社会既包括资本的逻辑，也有传统社会的逻辑和再分配经济的逻辑。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就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换言之，不

同地区的社会发展可能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的照搬一种模式进行管理,而且,治理创新的效果很有可能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上海等一些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较高,可以更多地依托于发展自治性社会组织,而在西部地区则要更多的依托政府的政策倾斜与财政投入。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这种方式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自我管理,而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群众的自我管理。凡是群众自己能管的都应该让他们自己来管,建立自治性的社会组织,根据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自我管理。在法律和法规框架下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实行的自我管理,既是基层民主的一种形式,也是建立社会秩序有效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管理可以放开,让自治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

从阶层再生产的视角看待当前社会治理的意义在于,从本质上说,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文化价值冲突应该通过博弈、协商、谈判与合作的方法解

决,以达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双赢或多赢。现代国家中的阶层冲突已经可以采用法律的、制度化的方法加以化解,同时文化整合功能的发挥,将进一步强化社会成员之间共享的信仰并有助于统一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西方发达国家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正是一个逐步确立起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将这些观念逐渐植入大多数阶层民众的思想深处,成为其不可动摇的信仰,并强烈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建构和谐社会下的阶级合作,最根本的是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整合机制,同时辅助以文化价值的导向作用。在这个基础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将与制度设置和政策安排密切相关,其中包括,群众性组织真正回归到它的群众性,成为利益群体组织;加强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法制建设,提高干部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执政党纪律作风建设与社会改革的持续深化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李强. 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到“碎片化”的利益群体——改革开放30年与我国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 (J). 新视野, 2008, (5).
- (2) 李路路, 陈建伟, 秦广强.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 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J). 社会, 2012, (5).
- (3) 仇立平. 回到马克思: 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 (J). 社会, 2006, (4).
- (4) [德] 马克思·韦伯. 经济与社会 (M). 阎克文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5) 孙立平.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 (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 (3).
- (6) 沈原.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J). 社会学研究, 2006, (2).
- (7) 刘鹏. 改革开放与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J). 理论与改革, 2005, (1).
- (8) [法] 皮埃尔·布迪厄. 布尔迪厄访谈录: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M). 包亚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9) [美]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M). 李猛, 李康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9) 刘欣.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J). 社会学研究, 2007, (6).

(责任编辑: 王云川)